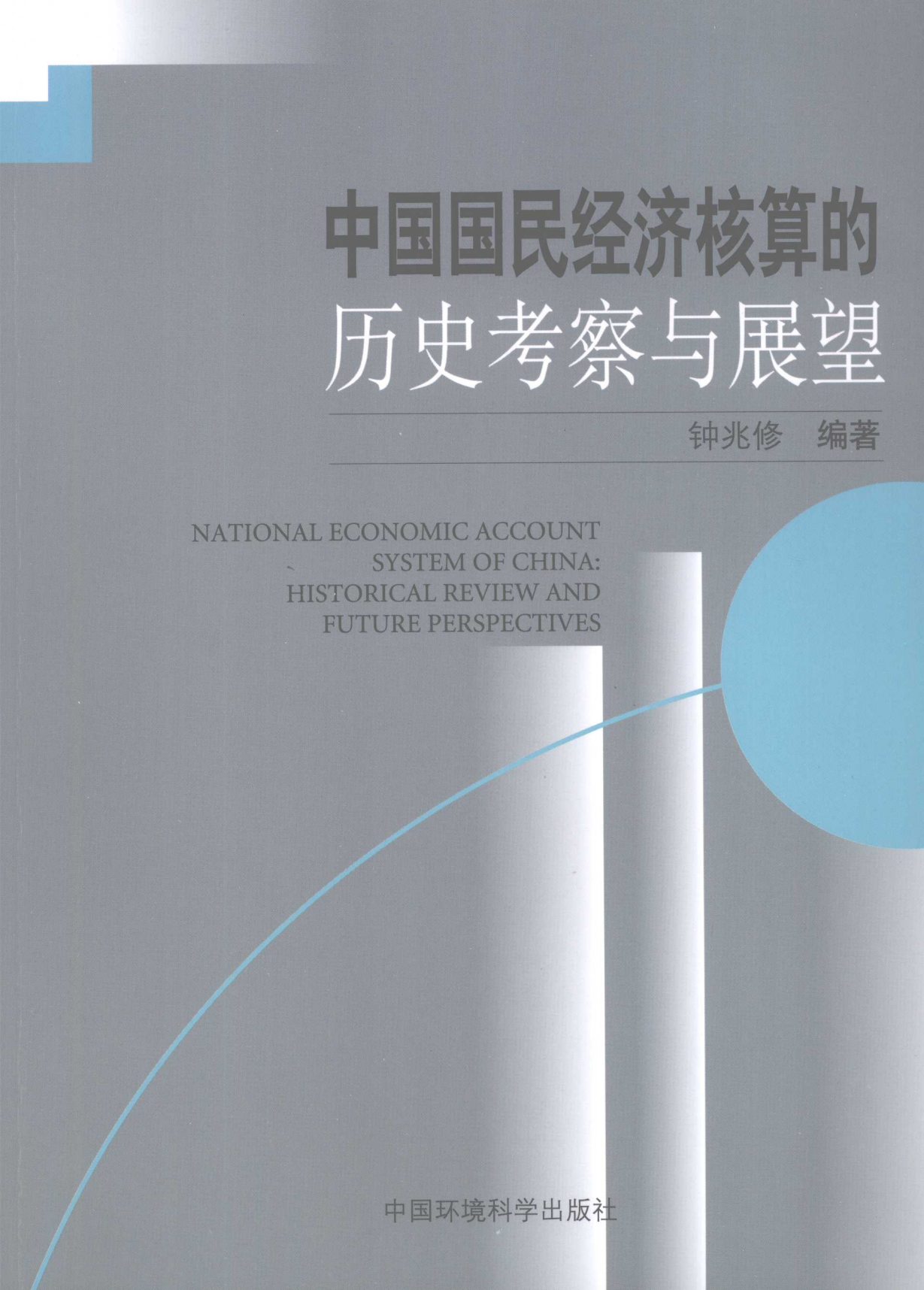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 历史考察与展望

钟兆修 编著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
SYSTEM OF CHINA:
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 考察与展望

钟兆修 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钟兆修编
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209-885-5

I. 中… II. 钟… III. 国民经济—经济核算—
研究—中国 IV. F2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029 号

责任编辑 陈金华 杨 洁

责任校对 刘凤霞

封面设计 龙文视觉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2 插页 1
字 数 47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序言（一）

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信息的核心，是领导机关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基础。兆修同志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 1950 年直到 1990 年离休，都在东北大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参与和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司（综合司）的工作，历时 40 年之久，可以说是为国民经济核算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离休之后，不甘于享受暮年的清闲，潜心写下了这本 40 多万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三方面的价值：它是一本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的发展史；又是一本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书；还是一本今后如何建立、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可贵的探索录。

第一，这本书系统地描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讨论决策的经过。

据我所知已经出版的几本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著作，主要是对这一问题的横向阐述（这当然很重要），至于纵向的历史描述，此书还是第一本。本书在简要地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和旧中国学者对国民收入（所得）的研究情况之后，以大量篇幅叙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所经历的 3 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中期，适应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我国实行经济交流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的国际情况，采用了 MPS 体系，这是第一阶段。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初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打破西方封锁禁运后对外经济交流逐步扩大的国际情况，实行“中国式的 SNA 体系”，这是第二阶段。从 2000 年起，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加入 WTO 后更广泛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便于国际经济信息对比和共享的要求，强化了 GDP 的核算和三次产业的划分，完全采用了联合国的 SNA 体系。这是第三个阶段。

MPS 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或称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和 SNA 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称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基础。前者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适应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力求缓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尖锐矛盾，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应该说，这两种核算体系，在经济基础理论特别是经济范畴本质论的层次上，是具有根本区别的；但在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数量描述方法论的层次上，又有许多相通之处。从总体上看，不管是否自觉，都跳不出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化再生产客观规律。当然，在对宏观经济运行描述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各有其特点。在核算范围上，MPS 重视物质生产的核算，对于非物质生产只纳入了交通、电信和商业等部门的活动，没有把它提到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SNA 对货物与劳务进行全面核算，但没有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并分别加以核算。在核算方法上，MPS 有净产值（国民收入，即 $V+M$ ）和总产值（ $C+V+M$ ），但在实际应用中总产值往往起主要作用，而这个指标是包含着中间消耗 C 的重复计算的；SNA 有国内生产净值（ $M+V$ ）和国内生产总值（ C_1+M+V ，即 GDP），但在实际应用中国内生产总值起主要作用，仍然存在着 C_1 这部分中间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大体相当于固定资产折旧）的重复计算。在归集资料的方法上，MPS 主要利用平衡表；SNA 不仅利用平衡表，而且利用账户和矩阵（俗称“棋盘表”），可说是更进了一步。

我国在前述第二个阶段实行的“中国式 SNA”，其特点是：既可对物质产品和劳务进行分别核算，又可对两者进行综合核算，求得总产值、增加值、净产值；既可保留 MPS，核算国民收入（NI），又可建立 SNA，核算 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个体系体现了留故纳新、中西结合的精神，曾经获得国内外一些人士的好评。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曾开展过一次历时 6 年（1985—1990 年）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大讨论。本书对这次大讨论的诸多问题作了详述的叙述。这种“中国式 SNA”及其讨论过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的重要历史资料。

第二，这本书对于各个时期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变化，是密切结合当时宏观经济中比例关系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的，因

而对于研究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比例的变化,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的变化(实质上就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C、V、M与第I部类、第II部类比例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关系,如生产力的地区配置、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关系等。从历史上看,凡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时期,就是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反之,就是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期。书中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收入生产、消费、积累的发展变化情况,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跃进”中积累、消费的比例、工农业比例失调及随后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乃至对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速度与比例关系,以及当前的国民经济状况在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方面的情况,都作了若干描述,并力求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经验数据,探索那些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数量界限。书中在列举和研究这些经济数据时,常常指出由于核算方法上的问题而存在的相互矛盾或不够真实之处,并提出解决、纠正的意见。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这本书不仅回顾和反思了核算方法的历史,而且针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核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逐步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意见,特别是首创了“开放式绿色核算”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建立绿色核算的根据和框架设想。书中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发展成就是投入多少各类资本(或资源、资产)而取得的?效率高吗?这些资本的丰度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安全吗?发展成果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公平吗?”接着,作者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3个问题:一是自然资源消耗过大。矿产资源消耗速度大大超过GDP增长的速度。矿产资源回收率只有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我国国有骨干矿山有2/3已经进入中老年期,45种主要矿产中有一半以上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大于探明储量的增长速度,石油、富铁矿、铜等重要矿产进口量在不断增加。二是环境形势严峻。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患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是贫富分化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国际上通用的测量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公认的警戒线为 0.4, 我国 1999 年为 0.397, 2004 年为 0.465, 由此而引发某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作者遵循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国务院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要求, 针对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利用率不高、环境压力大、分配关系不顺不公等状况, 提出“有必要在 SNA 的基础上, 研究建立符合中国情况的绿色核算体系, 即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并阐述了这一核算体系的含义(广义的、狭义的), 提出了核算体系总体框架的初步设想。

(二) 关于“绿色 GDP”的核算。推行绿色核算的第一步, 是核算“绿色 GDP”。它与传统 GDP 相比, 不仅要扣除人造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而且要扣除自然资本消耗(环境成本)。有人认为这种核算缺乏理论基础, 也有人认为核算的方法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本书首先回答了核算方法的理论基础问题, 然后详细地介绍了国外专家以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计算案例, 为解决计算方法技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 关于环境资源核算如何货币化的具体方法。绿色核算与传统核算的根本差别, 在于两者核算的对象不同。传统核算的对象是市场范围之内的经济活动, 各种实物和劳务通过市场活动已经形成了货币化的价格; 但环境核算的对象却是市场经济范围之外的“外在性”经济活动, 对它们的货币化价格如何进行计算, 是一个复杂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书设置 3 个专章, 分别从 3 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①环境成本和环境治理效益的核算方法; ②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的核算方法; ③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各章都力求结合实例进行研究。其中关于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 收集了我国 46 个城市(包括京、津、沪、渝四大城市、26 个省会在市、16 个中等市)的实物指标资料, 对 7 个方面的环境成本(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项治理成本, 人体健康受害成本, 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损害成本), 进行了货币化的核算。这一案例是很值得重视的。

(四) 创立了“开放式绿色核算”的理论和方法, 填补了国际上绿色核算研究的一项空白。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 有一个本地区、本国环境系统与外地区、外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核算的问题。我国政府规定的环境成本处理原则是: “谁污染, 谁治理”; “谁开发, 谁保护”; “谁破坏, 谁恢复”; “谁使用, 谁补偿”。这些原则明确了

环境越境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原则。问题在于：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何落实到绿色核算的方法上呢？如果不能经过核算加以量化，上述原则不是等于空谈吗？

兆修同志对于这个难点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 2000 年广州举行的有中外学者参加的国际城市和地区统计委员会第 22 届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开放式城市绿色 GDP 的研究》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封闭式绿色 GDP”（ GDP_I ）和“开放式绿色 GDP”（ GDP_{II} ）两种概念，并对两者分别给出了计算公式。 GDP_I 的公式中，只计算本地区的环境成本； GDP_{II} 的公式中则同时计算跨地区的环境成本（包括 10 个公式）。在后者的计算中，对于跨地区环境成本的“输入量”与“输出量”引入了会计学的方法：自然资源输出方和污染输入方，要计算“债权”或“应收未收”补偿金；同时，自然资源输入方和污染输出方，则要计算“债务”或“应付未付”补偿金。论文不仅给出了相应的公式，而且进行了两组实例计算。一组是关于自然资源输出输入的案例：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城市一次性能源（煤炭、石油）耗减成本和绿色 GDP_{II} 。各市一次性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同：上海市为 100%，北京市和天津市分别为 81% 和 56%，重庆市则自给后还有少量输出。按照每吨标准煤的资源租金假设为 200 元计算，则四个市在 1998 年 GDP_{II} 的核算中因输入自然资源（煤炭、石油）生成的“债务”占该市传统 GDP 的比例：上海市为 2.6%，北京市为 3.2%，天津市为 2%，而重庆市因输出自然资源而生成的“债权”相当该市传统 GDP 的 0.4%。另一组是关于环境污染输出的案例：两个中等城市（山东省烟台市、福建省三明市），按 GDP_{II} 核算中输出污染物（专指使用能源排放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损失）而形成的“债务”，分别占两市传统 GDP 的 1% 和 2.2%。这篇论文在会议上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论文的内容已写入本书第 15 章）。我认为，在科学研究上哪怕是前进一小步也是难能可贵的；兆修同志关于“开放式绿色 GDP”的创见，在核算方法论上解决了地区间乃至国家间环境成本的交叉影响问题，从而为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补偿”等项原则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成就是值得钦佩和赞扬的。希望学术界和有关方面加以重视，并结合实践加以完善和发展。

开放式的绿色 GDP 核算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国际关系，减少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过量占有和污染输出所欠的“债务”。

2001 年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债务高峰会议指出,发达国家总以为别人欠他们的债,殊不知社会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生态债务。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占世界人口 15% 的高收入国家使用了全球商业能源的 50%,人均能源使用量是低收入国家的 10 倍。其中,美国 1998 年能源净进口 4.8 亿 t 石油当量;1997 年美国 CO₂ 的排放量为 56.5 亿 t,占全球 CO₂ 排放量的 23.7%。按“开放式绿色核算”的公式计算:如果每吨石油当量的资源租金为 200 美元,则美国“应付未付”的补偿金为 960 亿美元;将 CO₂ 按比例折算成碳,如果每吨碳的边际损害成本为 20 美元,则美国对全球造成的“应付未付”补偿金为 310 亿美元。仅此两项所生成的“环境债务”达 1 270 亿美元。联合国 1992 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 13 指出:“各国应制定关于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国家法律……进一步制定关于在其辖区和其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对其管辖范围外的地区造成的环境损害的不利影响的责任和赔偿的国际法律。”联合国召开的同一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在谈到“持续发展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增加投资”时指出:“发达国家应提供国民生产总值(GNP)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ODP)”,并“减少发展中国家外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定的补偿,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既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 and 做法,又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体现本国应有的特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表现在 3 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合理拉开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后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和 200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说过: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但是历史并没有证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能建立起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我认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主要特色，应当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 3 个特点。关于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第三个特点的内容，在这本书中已经原则上谈到了，这是很好的，希望能进一步具体化。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特点，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却没有谈到，我认为应当把它加进去。基本经济制度是载入了我国宪法的。它实际执行的情况如何，当前公有制经济占多大比重，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占多大比重，国家统计局部门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单位，应当统计清楚并向社会公布，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我看到世界银行发布的《1999 世界发展指标》中有一张统计表，列有各国国有企业经济活动占 GDP 的百分比（1985—1990 年，1990—1996 年）的栏目，载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数字却是空白。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希望今后加以弥补。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宪法载明的基本任务。适应上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不断地改进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方法。兆修同志的这本著作，对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乐于把它推荐给一切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特别是中青年朋友。当然，书中的个别论点，可能有不尽妥善之处；对于某些问题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不同看法，可以充分地展开讨论，通过相互切磋，使大家的认识更加深入和提高。我今年 87 岁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青年朋友。

李成瑞

2008 年 8 月 1 日

序言（二）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一书，经作者辛勤耕耘终于著就，在即将付梓之时邀我作序，我虽然多疾缠身，遵医嘱已封笔数年，深知思维迟缓，举笔笨拙，难以担当此任。但经粗阅书稿，为作者的勤奋精神所感动，欣然从命，勉为其难地来偿作者之愿。

本书作者已届耄耋之年，本应选择颐养天年之路，但却另辟蹊径，笔耕不止，在无涯的学海中永不停息地探索、探索、再探索，真正地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的人生价值，令人敬佩，可喜可贺！

本书作者毕生从事统计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积年累月，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研究的历史跨度达 300 余年之久，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在理论和方法论的论述上皆有独到之处：在理论方面，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精华部分皆为其所用；在方法论方面，从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的计算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直到现代三次产业以及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绿色 GDP 的计算方法，都一一加以论述，读之给人以触类旁通、行云流水之感。

国民经济核算学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边缘学科。其理论基础借助于哲学和经济学的成果；其方法论借助于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计量经济学的成果。

因而，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发达、发展）的国家，皆可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用之。在经济全球化波澜壮阔发展的当代，为了科学地进行国际对比，也必须用之。

任何学术著作、论文，都试图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代或时期的某一领域的真理。而真理具有两重性，即相对性和绝对性。

例如本书所引述或论证的各个时期的论点,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绝对性的表现;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旧有的论点不能说明新事物,旧论点可能被否定,需要新论点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旧论点只具有相对性;无数的相对真理之和构成了绝对真理,本书所研究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大跨度中的某个世纪或者某个时期的只具有相对性的论点综合起来,说明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历程,这也是绝对性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只用现实论论点这一把尺牍来苛求作者解释逝去的某一历史时期的现象。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观去求解,才能得到正确答案。

本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研究和现实工作都极具参考价值。本书是史料书,给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史、需查阅浩瀚史籍者提供了线索,提供了门牌号数。本书所阐述的理论,特别是方法论,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按“厚今薄古”的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历程与成果尚欠笔墨;全书的论述稍显零散,逻辑体系尚欠严密,这里不逐一赘述,可请读者不吝指教。

张塞

2008年1月30日

序言（三）

（读钟兆修同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书稿有感）

钟兆修同志 1950 年大学毕业，1990 年离休，其间整整 40 年从事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的实际操作和组织、领导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工作（本书作者注明：金昌同志当时任研究部部长）时，曾主持“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并编著有《资源核算论》（海洋出版社，1991）一书，钟兆修同志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贡献颇多。钟兆修同志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加之他对国民经济核算事业的热爱、敬业和奉献精神，使他能在离休多年以后，以耄耋之身写下 40 多万字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以下简称《历史考察与展望》），留香今人和后世，功德无量，可钦可佩！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测量系统、科学管理与决策的信息系统、社会经济运行的报警系统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共同语言系统。总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主要指标是宏观经济信息的核心，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的基础。《历史考察及展望》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论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或称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中国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称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再到正在研究的经济与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的整个发展过程，来龙去脉，以及每个发展阶段核算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问题、革新和发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温故而知新，温故而创新。这样一部我国经济与核算方法的发展史，对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工作，肯定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后半部分，着重讲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书中除说明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外，

主要介绍了联合国制定并建议各国试行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或称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的具体内容和核算方法，而且还提出了“开放式绿色核算”的概念，将地区和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环境问题的交叉影响纳入核算范围，具有创新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正确地强调了几个重点问题：绿色概念的界定、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核算、绿色 GDP 核算、政绩考核、环境成本核算与环境效益核算，以及研究保障等问题。在此，我借题发挥，多说一些意见。

绿色概念的界定 资源（指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三者概念上各有侧重，但又互相包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同义语。因为，从环境角度看问题，一切自然资源及其呈现的生态状况，都是环境的构成要素；从资源角度看问题，环境和生态都是自然资源；从生态角度看问题，资源和环境都是生态的载体，如果没有资源、环境，生态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环境因素、环境保护、环境价值、环境核算等中的“环境”，都包含着资源和生态的内容。对与环境因素有关的事物冠以“绿色”，已成国际惯例。所以，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也称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现在一种习惯的简单的叫法就是绿色 GDP 核算。

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核算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资源环境的实物量核算虽不完善，但早已有之。关键问题是其价值量核算。过去，在东方，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没有价值；在西方，认为不能交易的东西没有价值。所以造成“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扭曲，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以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恶果。现在，情况不同了。资源、生态、环境有价值，已成社会共识。环境因素的价值量核算是连接环境核算与经济核算的一座桥梁，唯有环境因素的价值量核算，才能将环境与经济融为一体，才能完善地进行环境与经济的综合核算。绿色核算的关键，是环境价值的计量。由于许多环境因素还没有市场价格，所以环境价值计量面临不少困难。万事开头难，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抓住主要环境因素，借鉴国内外现有的一些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建一套易操作的计量方法，先行试点应用；然后，再从粗到精，逐步完善。

绿色 GDP 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

(GNP) 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包含国与国之间要素收支核算的是 GNP, 不含者为 GDP。传统的 GDP, 由于不考虑环境因素, 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即使损毁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它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 因为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计算产值的。将这样的 GDP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主要信息依据, 定会的发展引入歧途。研究、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就是为了充分纳入环境因素, 克服传统 GDP 核算的缺陷。绿色 GDP 的核算, 一方面, 要将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而导致的环境质量降低、环境价值量减小, 作为资本损耗来看待, 从 GDP 中扣除; 另一方面, 也要将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产生的效益而导致的环境质量提高、环境价值量增大, 作为资本形成来处理, 加入 GDP 当中。可见, 在同一时期, 环境价值的减小量和增大量两项相抵, 其净变化量才是决定绿色 GDP 大小的关键。如果在同一时期内, 环境价值的减小量与增大量相等, 则绿色 GDP 与传统 GDP 相同; 如果环境价值的减小量大于增大量, 则绿色 GDP 小于传统 GDP; 如果环境价值的减小量小于增大量, 则绿色 GDP 大于传统 GDP。由此可见, 绿色 GDP 既可能小于传统 GDP, 也可能大于传统 GDP, 就看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政绩考核问题 现在, 我们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实施大提升战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而且还将这些内容写进了党的章程; 环保投入大量增加; 环保主管机构也由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党和国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注意力由过去单纯追求 GDP 的增长, 转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同时, 要建立党政干部的绿色考核制度, 明确各级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而且要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并把环境保护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考核结果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历史考察与展望》提出, 建立绿色 GDP 核算之后, 传统 GDP 还要保留。对于政绩考核, 绿色 GDP 就要起主要作用了。

环境成本核算与环境效益核算 2004 年 3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与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 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的相对平衡的关系。” 2006 年,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

定》中也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逐步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本书提到“既要核算环境成本，也要核算环境效益”。这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据说，现在推行绿色 GDP 核算在一些地方遇到了阻力。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前已述及，绿色 GDP 的核算，一方面要做减法，将环境损失成本从传统 GDP 中扣除；另一方面还要做加法，将保护环境获得的效益增值加入传统 GDP 当中。绿色 GDP 既可能小于传统 GDP，也可能大于传统 GDP。可是，现在推行的所谓“绿色 GDP 核算”，只讲减法，不讲加法，只核算环境成本，不核算环境效益。如果不核算环境效益只是因为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而暂未实施的权宜计，只要加以说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从传统 GDP 中，扣除环境问题的损失成本之后，余下的就是绿色 GDP。”将绿色 GDP 作这样的定义是有害的。因为，按照这样的定义，在环保方面，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你做了多少工作，也不管你已经取得环境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的多少成果，“绿色 GDP”永远是低于传统 GDP 的。在环保已成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情况下，这种扭曲、片面的“绿色 GDP”叫人怎么接受得了。

保障绿色核算研究 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绿色核算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鉴于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本书提出了一些保障研究的建议，诸如国家要设立适当机构，配备一定人员，拨付适量经费；组织多学科专家，协力进行研究；夯实绿色核算的基础，开展企业绿色核算研究等。这是非常必要的。

通观本书，除感到个别地方尚欠精练、绿色核算部分环境效益核算论述稍欠充分之外，总体看仍是一本好书。稍作润色出版，定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李金昌

2008 年 9 月 25 日

前

言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前景如何？本书试图作个历史考察与展望。国民经济核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深深地刻印着社会经济发展每个阶段的印迹与特征。历史考察就是对这些印迹和特征加以描述。国民经济核算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的。21 世纪伊始，中国进入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时代。展望就是希望把这个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尽力逐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实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这个新时代。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过程。在简要地叙述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和旧中国学者对国民收入（所得）的研究情况之后，对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的发展历程以大量篇幅作了描述，对 1985—1990 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轨变型的大讨论中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对各个时期呈现出来的某些重要的经济画面试图利用核算资料作些初步的剖析，对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参照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作些简略的探讨。下篇讲适应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逐步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成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质量退减成本，绿色 GDP、开放式绿色 GDP 的理论、方法、案例、功能，以及组织保障等作些梗概的阐述。

面对这样时间跨度大、涉及面较广的课题，要把它整编成册，对我来说，有一定难度。近 21 年的离休生活，过去的事，可能贻误。近期发展变化了的实况，了解很少。因而几度提笔，几度投笔。时至今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考察与展望》才得以问世，敬希读者指正！并谨向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张塞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金昌同志，原国民经济平衡司、